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2

■E-mail:dushubao@263.net 2019年9月4日

第461期

13



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

■陈平原

随着年龄增长，我有幸不时应邀在各种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上致辞。渐渐地，摸索出规律来——毕业典礼致辞不妨放松，没必要太叫真，因人家已经完成学业，明天就要走上社会大展宏图了，你还千叮咛万嘱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说不定还讨人嫌。因此，注重现场效果，大家都很嗨，没扯漏，这就行了。开学典礼不一样，都有新鲜感，学生们躊躇满志，师长若讲得好，多少还能发挥作用。正因如此，这回应邀在北大中文系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演讲，我决定认真准备。

这一认真，可把我害苦了——翻阅自己历年在各种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发现好多精彩的话都讲过了，不好意思重复。若改为应景文章，则或太俗，或刺耳，弄不好还翻车。思前想后，还不如从自己的经历说起，三十五年间，如何从一个咄咄逼人的博士生，变成了循循善诱的老教授。时光流逝，不只时代变了，入学典礼的致辞方式也在悄然转移，诸位不妨以知识考古的眼光，看待我不甚精彩的演说。

记得很清楚，35年前，也就是1984年9月的一个下午，暑气未消，北大文史楼三楼的教室里热气腾腾，坐满新入学的研究生及指导教师。我经历过上山下乡，年龄偏大，作为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不太容易被豪言壮语打动。可猛然间一声断喝：“你说

全世界研究汉语言文学哪里最好？”不容听众反应，教授自己作答：“当然是我们北大！”不用说，“我们北大”四字一出，研究生们不约而同地挺直了腰杆，会场里静穆了好一阵。连我这么挑剔的听众，也都被深深感染，更不要说学弟学妹们。这个细节，我在《“最好”的感觉》（2000年3月31日《北京大学校刊》）一文中提及，不过没说那“一声断喝”的教授名字，这回透底——那是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教授，当时是北大中文系副系主任。

我的学生中有不少纯北大，甚至有从北大幼儿园念起的；我则是带艺技师，博士阶段才进的北大。正因不是纯北大，我特能体会北大好，也了解北大的缺憾。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写了好些谈论北大的文章，普通读者认定我为母校评功摆好，北大领导则埋怨我表扬得不够，尤其不该在关键时刻挑剔。在《从中大到北大》（【香港】《纯文学》复刊三期，1998年7月）中，我比较北大与其他中国大学的差异：“记得张爱玲说过，香港是个夸张的地方，在那里摔一跤，比在别的地方摔的都疼。北大也是如此。在这里，出名容易，失名也不难，而且速度都很快。……正因为太容易得名，北大人必须时刻警惕名至而实不归的危险；也正因为可能领导潮流，过度热心于此，难免为潮流所裹挟。”多年后，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把话说得更明白：“在我看来，这

是一所戴着耀眼光环、某种程度上被拔高、被神化了的大学。身处其中，你我都明白，北大其实没那么了不起——就像所有中国好大学一样，这里有杰出的教授与学生，可也不乏平庸之辈。面对父母谈论子女时骄傲的神情、亲朋好友以及同龄人羡慕的目光、社会上‘爱之深恨之切’的议论，作为北大人，你都必须挺直腰杆。享受北大的‘光荣与梦想’，也就得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你都会碰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记得身后有无数双殷切期盼的眼睛，就能尽力而为。”（《训练、才情与舞台》，2011年8月3日《中华读书报》）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过一段很提气的“大话”，后来常被引述。我说：北大目前不是、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北大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却不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难以比拟的。这是因为，北大伴随着一个东方古国的崛起而崛起，深深地介入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这一历史进程。对于以培养人才为主要职责的大学来说，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领域里如此大显身手，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北大传统，以及显得有些“不切实际”的远大志向，在我看来，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而完全失落（参见《北大人的精气神儿》，2001年5月16日《中华读书报》）。

我当然明白，白云苍狗，世事变幻，一代代北大人的表现，并不都尽如人意。但有时候是大环境的问题，不是你“铁肩”“妙手”就能“铁肩”“妙手”的。

初为北大人，你最先感受到的，必定是校园里四处弥漫着的“豪气”。迎新会上，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学生代表，全都一副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模样。可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读书做学问，或者服务社会，光有志气与豪气还不够。十五年前，轮到我在开学典礼上致辞了，我说：“自从我读大学起，一直到今天，出席过无数次‘开学典礼’。这种场合，总会有著名学者谆谆教诲，除了提要求，再就是给鼓励：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开始听得很激动，渐渐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也属于进化论之类的神话？到目前为止，备受鼓励的我，并没觉得自己已超越师长；推己及人，我也就不想乱抛高帽，说你们将来一定比我强。其实，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与局限；祸福相依，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同一个舞台》，2004年9月8日《中华读书报》）自以推心置腹，可学生们听了不太开心，说是缺少激情，没能让他们热血沸腾。

于是，我也开始讲究说话艺术，立场还在，但口气委婉多了，

比如提醒北大学生：“任何一所正规的大学，都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稳定的教学秩序；但不是每所大学都能像北大一样，容许甚至欣赏才华横溢因而可能桀骜不驯的学生。谁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可一旦有了规矩，必定对个人志趣与才情造成某种压抑。如何在规矩与个性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让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既感觉如鱼得水，又不至于误入歧途，对于教育家来说，是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在我看来，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为中才设立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北大人的精气神儿》）。表扬北大“兼容并包”，学校管理灵活，学生活动空间较大，可我还有下半句话，常被有意无意忽视——天才毕竟极少见，空间大而规则少，导致北大毕业生水平参差不齐。单个人你看不出来，能被广为传播的，都是杰出人才；必须有全局眼光或俯瞰视角，才知道事情的另一面——依北大之地位及国人之期望，成材率不够高，是个隐藏多年的大问题。

能考入北大的，都是有才情的；在中国，北大的舞台可以说是最好的；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北大学生生日后表现欠佳？这就说到北大人普遍存在着的对于天才的期许，以及对于训练的藐视。我多次引用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寄语：当初我来北大呈送论文，钱理群转达王先生的两句评语：第一句“才华横溢”，很好；第二句则让我惊出一身汗：“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诸位请记得我的提醒——好大学及好教师能做的，不是平地起高楼，让笨蛋成为天才；而是让你们的才华别随意挥洒，尽可能聚拢起来、提升上去，以及在某个关键时刻精彩绽放。

十一年前，也是北大中文系新生入学典礼，我的发言题目是《请加入这道“风景”》（《启迪》2008年8月上），其中有这么一段：对北大学子的自视甚高，我虽略有怨言，但表示理解和同情。记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开学典礼上，老师都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但在北大，经常听到的却是鼓励：要立大志向，做大学问。……在一个讲究实惠，普遍缺乏理想性的时代，北大学子的“辽阔”和“狂傲”，还是挺可爱的。只是为了让其日后走上社会，别摔太大的跟斗，必要的时候，会敲打敲打。但有言在先，将北大学生训练得全都谦恭有礼、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那绝不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不为时尚及潮流所裹挟，在相对宽松、自由且优雅的燕园里独立思考，努力耕耘，每年都会从这里走出若干杰出人才。今天在座新生305位，不可能每个人日后都取得伟大的业绩，学校及院系的任务是尽可能提高成才率，落实到具体学生，则希望将来站在王先生的两句评语：第一句“才华横溢”，很好；第二句则让我惊出一身汗。

陶渊明始终是元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偶像

■傅秋爽

学界多数认为陶渊明在元代影响较小，受关注不多。权威史料集成《陶渊明资料汇编》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联合编著，在《历代陶渊明研究情况简介》就说：“陶诗真正受到较为普遍的重视是从唐代开始的……到了宋代，对陶渊明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元代研究陶渊明的很少，到了明代才又逐渐多了起来。……到了清代，对陶渊明的研究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至今依然被很多学者接受。但其观点和结论有失偏颇，与史实不符，值得商榷。

元代，表面看对陶渊明进行理论性的文字研究的确不多。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陶渊明在元代的影响不是弱化，而是增强了。打开元人作品集，陶渊明气息就会扑面而来；叹世、隐居、及时行乐、否定功名这些打着陶渊明鲜明烙印的思想俨然就是元代文学中最热门话题。散曲中这样的主题占据了半壁江山，诗歌、散文、杂剧中同样的思想也充斥其间。陶渊明在元代有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表现为不再是个别作家创作主题，而成为几乎所有作家创作不可缺少的题材；其次，不再像唐宋那样停留在表象化的议论、唱和、仿作，而是深化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和人生理念；第三，不是停留在口头，而是开始以一种新的形式落实在生活实践中了；而且，陶渊明的影响贯穿整个元代始末，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更加全面、深入而广泛，影响到了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因而，元代不仅同样是中国历史上陶渊明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更是唐宋与明清之间继续开来的联接，更是陶渊明价值别具一格的时代体现。

一、在整个有元一代，陶渊明始终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偶像

（一）元代士人消极避世的吟咏特盛，这种灰色基调从元初的耶律楚材和刘秉忠就已经开始，并贯穿整个元朝始末。

虽说鄙视功名、归隐田园的创作主题自古有之，至东晋陶渊明更成为专门题材。但历史上都不过是文坛创作中的点缀，由少数作家偶尔为之，顶多因为主题相似形成流派而已，如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但到了元朝竟然成为整个时代文学创作主色调之一，这是其他朝代所没有出现过的。一般而言，当一个新兴政权处于上升阶段，建功立业会成为整个社会时代主旋律，陶渊明隐逸避世思想往往会有所减弱。即使提到陶渊明，呈现出来的也是热爱自然，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坚持操守等欢悦、健康、积极向上的那一面，唐代和宋代崇尚陶渊明的角度和理由有区别，但情况大抵如此。而元则不然，从元初，许多人的创作中，陶渊明隐逸避世思想就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以元朝开国功臣、元代文学开创者耶律楚材为例，他对元朝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至深，可就是这样一位深受成吉思汗等帝王信任重用且大有作为的伟大政治家，却把陶渊明奉为异代知音。《和黄华老人题献陵吴氏成趣园诗》：“丁年彭泽解官去，傲游三径真三友。悠然把菊见南山，畅饮东篱醉重九。……知音谁听断弦琴，临风痛想纱巾酒。嗟乎路声利人，不知曾忆渊明否。”耶律楚材所作《湛然居士文集》存诗六百余首，其中有相当的部分表达了对陶渊明个人情操、人生选择和生活态度的认可，追慕归隐、恬淡、简约、任真、热爱自然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比重，厌恶官场丑恶，倍感孤独的悲愤避世也随处可见。元初刘秉忠，深受忽必烈倚重，在元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京城大都（今北京）的选址、设

计、建设中居功甚伟。就是这样一位位极人臣备受上下尊崇的高官，却说“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美子】），在【桃花曲】表达的则是远离功名利禄，寻求心灵宁静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历史上，成吉思汗、忽必烈作为世界上疆域最广、最强大帝国的开国、立朝之君，基本算得上开明、纳言、用贤的圣明之君，在他们麾下曾经大有作为备受宠信的政治家们内心感受尚且如此，到了元朝中后期，随着社会政治黑暗的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帝权更替的无序，官场生态进一步恶化，陶渊明消极避世、及时行乐的思想大行其道，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

（二）崇陶、亲陶、学陶作家众多，各个门类文学艺术家积极参与。

元代作家的身份与唐宋相比，显然更为复杂。唐宋，由于严格遵守科举选拔用人制度，所以作家大多都是已经荣登仕途的官僚或正行走在仕途道路上和刚刚脱离了仕途的文人士大夫。地位有高低，前程各穷达，但是相对来说身份地位、教育背景较为单一，思想基础、价值观念、目标追求基本一致。元代作家则不同，由于科举废除，官吏晋身渠道和途径很不一样，社会职业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和多样性，思想也更为开放。既有因祖荫而获高官的贵族，也有凭科举而入仕的官吏；既有王恽这样政府机构任职的翰林清贵，也有关汉卿等那些依靠杂剧市场谋生的自由撰稿人；既有程度不同汉化的了少数民族，也有功底深厚的理学家或者是宗教僧侣。但是几乎所有人的创作中，都能找到推崇陶渊明的内涵和影子，每个人的作品中，都诉说着对现实的不满和避世逃遁的愿望。

胡祜禛（1227—1295）是元代

前期文化修养比较高的官员，为人豁达开明。他作【双调·沉醉东风】二首。第一首把贪官暴吏比作虎狼，他愿逃离官场，与鸥鹭为盟。第二首他赞美山野中的渔夫樵夫是不识字的士大夫，表达了对没有上，或吉思汗、忽必烈作为世界上疆域最广、最强大帝国的开国、立朝之君，基本算得上开明、纳言、用贤的圣明之君，在他们麾下曾经大有作为备受宠信的政治家们内心感受尚且如此，到了元朝中后期，随着社会政治黑暗的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帝权更替的无序，官场生态进一步恶化，陶渊明消极避世、及时行乐的思想大行其道，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

（三）全方位传承，话题广泛，特定主题在思想深度和广度上得到充分挖掘开拓。

著名的陶渊明研究专家袁行霈先生，在其《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一文中将陶诗的主题创新归纳总结为四种：第一，表现归隐；第二，表现饮酒；第三，表现固穷安贫；第四，表现生死。元代文学创作几乎继承了陶渊明创作主题的全部内容。这与唐朝、宋朝每个时代各有侧重不同。唐代推崇陶渊明的品德高洁，宋代称誉陶渊明的气节坚贞。而元代对陶渊明文化主题则是全面继承，在生死主题方面尤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开拓，特别强调避世远祸，及时行乐，感情也更为复杂。很多作品在赞美陶渊明、许由、范蠡等人避世全身人生智慧的同时，往往与屈原这些历史上广受尊崇的圣贤相对举，对后者因执着忠君或坚持理想表现出极度不屑，觉得他们这样死于非命不值得，缺少人生智慧。一生为民死而后已的张养浩就曾写道：“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几个般，要安，要安，怎如俺教僧侣。但是几乎所有人的创作中，都能找到推崇陶渊明的内涵和影子，每个人的作品中，都诉说着对现实的不满和避世逃遁的愿望。胡祜禛（1227—1295）是元代

官的刘敏中，曾因为弹劾权臣桑哥而差点丧命。他在其作【黑漆弩】《村居遣兴》中就写道“便宜教画却凌烟，甚是功名了处？”对要青史留名这种在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孜孜以求的理想竟然持否定态度，而这样的观点在元代绝非特例。

二、陶渊明的在元代的深刻影响，多维而立体。

陶渊明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纵轴——时间与元代相始终；还表现在横轴——所有的艺术形式几乎无人不言陶渊明。除了传统意义的文学形式诗、词、曲之外，在元代新兴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杂剧、散曲和话本小说中，陶渊明也始终如影随形。以元杂剧为例，现存的就有关仲贤的《陶渊明归来吟》，王实甫的《刘晨阮肇误入桃花源》。而其他杂剧中通过各个人物口吻提到陶渊明和表现其思想内涵的唱词更是随处可见，枚不胜举。杂剧，这种以市民为观赏主体的俗文学，观众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决定着创作题材的选取和主题的确立，陶渊明题材有市场，陶渊明精神被接受，说明陶渊明在元代社会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已经被充分接纳的事实。

绘画方面，带有特殊文化标识意味的物象如“松”“菊”“柳”“鸟”“鱼”“把酒”“操琴”“孤云”“幽径”“樵夫”“渔夫”等这些陶渊明主题特有的标签，更是全面地进入到元代山水文人绘画的创作之中。就此而言，没有陶渊明，就没有文人画的神髓和文化依托。而元代绘画最突出的创新与贡献，就是将宋代开启的山水文人画推向成熟完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号称“元四家”，代表了文人画的最高成就。他们孤高超脱，淡泊功利，精神上追求洒脱无羁绊，技法上讲究得意而忘形，其根源在于陶渊明。从这个角度而言，没有陶渊明，世界上就没有审美独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意蕴的文人画。

即使是元代的日用器皿如青花瓷将军罐、磁州窑方瓷枕，也有不少以陶渊明归隐田园为主题的画作，与鬼谷子下山等传统的有吉祥寓意的题材一样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这说明陶渊明精神不再只是官场中文人士大夫的专利，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走入寻常百姓心中，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信仰。

三、元代陶渊明文化现象大爆发的社会根基

任何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远在东晋的陶渊明之所以在元代重新被发现被挖掘，拥有如此众多的拥趸，一方面固然是陶渊明诗本身的丰富、多面、具有恒久审美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历史文化长久积淀的结果。正如中国文化研究者林语堂先生在其著名的《中国人》一书所言：“因为田园生活的模式总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哲学与生活中的这种田园理想，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普通人的意识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今天的种族繁荣与健康的原因。……他们在诗歌、绘画、文学中一代又一代地宣传。”当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元代是一个社会矛盾、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王朝，科举制度的废弛，截断了文人“学而优则仕”的进身之阶，文人不再将“学得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当做唯一出路。政治秩序混乱，社会黑暗，一个人的晋身处世成为大问题。如何坚守做人的信念而不至于招致杀身之祸，如何保全生命延续而又不至于堕落于流俗，如何在寻常的生活中找寻到生活的诗意和乐趣，这些在其他朝代可能比较清晰的人生准则，在元代都受到了极大挑战。陶渊明的进退与持守成为给元代同样身处黑暗和痛苦中人们指引航程的灯塔就显得格外明亮。